ISSN 2521-4004

澳門學刊 Jornal Acadêmico de Macau 2023年總第五期 發行單位：澳門學人發展協會

澳門學刊
Jornal Acadêmico de Macau

2023年
總第五期

指導單位：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北京聯絡部
學術指導單位：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
學術顧問：饒戈平教授、陳端洪教授
發行單位：澳門學人發展協會
出版單位：東方國際學術出版社

ISSN 2521-4004

澳門學刊

「澳門學刊」2023年

Jornal Académico de Macau

2023 總第五期 /

指導單位：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北京聯絡部
學術指導單位：北京大學港澳研究院
發行單位：澳門學人發展協會
出版單位：東方國際學術出版社

學術顧問：饒戈平教授、陳端洪教授

顧問
葛軍偉、高明、劉金東、盧德基、梁祺健
周錦舜、趙斐、張異和

社長
高明、陳青飛

副社長
溫林鑒、楊博、張秀潔

设计排版
金曉、符申澤、Alex

業務電話
（853）28860065

業務電郵
Info@adem.org.mo

地址
澳門南灣大馬路619號時代
商業中心8樓G-5

網址
http://www.adem.org.mo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劉仁子

編　委
孔祥來
孔橋雨
王仁宏
王舒鴻
石永東
宋　薇
段嘯林
胡　坤
范雪珂
高　明
高振宇
張秀潔
陳志傑
陳僑予
黃穎祚
葛寧靜
潘韓婷
魏彥紅

編輯助理
王嘉政
蔣銘權
馮澤文
盧震豪
方詩敏
宋　溦

行政委員會
霍可欣、高長汀、張　卓、劉成昆
陳嘉賢、張任想、張菲菲、駱慧貞
張博亮、黃偉境、鄭鏗泰、黃利麗
方子樂、劉嘉駿、王子碩、張美然
陳嘉敏、陳瑜勇、譚文祥、吳志偉
朱英東、毛淑瑩、鄧浩基、吳妮娜
林嘉欣、吳婉雯、陳少梅、范庭瑄
方慧超、蘇子軒、余世康、莊子君
阮依芬、曹瑋龍、林　斌、譚鑫文
羅國良、宋粵平、賀　亮、羅鵬飛
石若璽、白華正、何家政



目 錄

從俄烏關係報導看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

——以《紐約時報》涉華媒介形象研究為例/常益敏 賀妍 1

融合與限制：港澳青年在內地的社會權保障/陳旭輝 15

《民法典》保理合同規則的理解與適用/談蕭 譚芷如 27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研究/盧頌馨 37

粵澳間個人數據流動法律監管的困境檢視與完善進路/盧語湉 46

價值、內容、路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影響研究/張可心 宋欣 55

16-20 世紀澳門教堂名稱漢譯特色及社會影響/潘韓婷 64

管中窺豹不過癮——評《銀造歷史》/柴年 75

澳門學人北京拜訪紀實 77

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研究

盧頌馨*

摘要：高等教育協同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規劃的應有之義。這不僅能夠促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還能夠解決大灣區的人才需求以及促進三地的文化交流。選取大灣區的高校為例，通過剖析高等教育協同發展中固有的實踐模式，同時比較三藩市灣區的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成功案例，探尋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如：受限於法律政策尚不完善、三地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三地各種制度差異較大等，導致尚未形成合力，最後提出相關的建議，從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協同發展。

關鍵字：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具體路徑

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

2019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其中提到了大灣區在教育領域的多層次和全方位的合作。當今，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呈現出新趨勢，與國家發展重大戰略越來越緊密，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是國家重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主動回應國家重大戰略。在社會意義發生和形成的過程中，高等教育是大灣區形成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屬性。研究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發展，乃至協同發展，從而探求符合大灣區發展規律的高等教育構建和持續發展的路徑。

（二）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追溯至上世紀，為了適應區域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也在不斷更新調整自身的發展方式。關於高等教育發展的研究主要出現在 20 世紀 90 年代後，主要包括：俞克新在其主編的《高等職業教育的理論探索與教改實踐》（1999 年版）中對高職教育從理論的角度進行了初步探索，討論的課程的設置與改革；劉金桂、史秋衡等在著作《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研究》（2004 年版）中通過與法條的結合來闡述研究高職教育的發展歷程；陸祉亦在《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的機遇挑戰及策略研究》中提出構建適用型、創新型、應用型教育體系，擴大職業教育發展空間與提升職業教育發展成效的同時培育與輸送高品質、全面型人才；[1]謝愛磊、李家新等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融合發展：背景、基礎與路徑》中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應秉持以融合統領發展、以創新驅動發展、以開放促進發展的基本原則，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進行制度創新、促進高等教育與產業的協同、提升國際化水準。[2]

---

* 作者簡介：盧頌馨，博士，深圳職業技術大學教師，粵港澳大灣區財稅法治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深圳市法學會港澳法律研究會理事，大灣區法治建設青年研究會理事。作者感謝遼寧科技大學經濟與法律學院碩士研究生蘇夢真同學協助收集相關資料。

資金項目：廣東省教育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廣東省職業學校公安司法與公共管理教學指導委員會教育改革項目“人工智能視閾下粵港澳大灣區高職教育機制創新研究——以法律職業教育為例 ”（項目編號：GDJG2021402，202115）； 2023 年度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質量工程項目“新職教理念視閾下高職院校法學專業課程思政要素體系建構問題研究——以《以刑事訴訟法》爲例”（項目編號：7023310198）；深圳市教育科學“十四五”規劃 2023 年度課題“邏輯-過程-目標”三維交叉融合的跨境數據法治人才培養策略研究（項目編號：yb23036）。

[1] 陸祉亦：《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的機遇挑戰及策略研究》，載於《太原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學報》，03，2019，4-7。

[2] 謝愛磊，李家新，劉群群.：《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融合發展：背景、基礎與路徑》，載於《中國高教研究》，05，2019，58-69。

（三）研究意義

本文從高等教育生態系統結構的角度出發，探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方向和路徑，不僅為我國其他區域高等教育協同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同時能夠優化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生態結構，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持續輸送高質量人才，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整體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促進區域的進一步協同發展。由此可見，這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具體如下：

1.緊跟社會發展趨勢，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應當不斷適應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促進經濟、教育、文化的發展，加快產業創新、產業結構轉型、提高綜合實力、儘早建成世界級城市群。[1]近年來，隨著各種規劃和政策落地，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進入了嶄新的時代。尤其是當今世界經濟進入了“亞太時代”，粵港澳大灣區正是位於亞太地區的中心地帶，而且香港和澳門是中外經濟交流的樞紐和多功能國際中心，承載著中外經濟合作重要通道的功能，因此區域的協同發展對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成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具有重要意義。在大灣區發展的進程中，高等教育應當有所作為。高等教育屬於意識形態層面，具備上層建築的特徵，而大灣區的建設是經濟基礎。高等教育與大灣區經濟建設之間是互生互動的關係，大灣區在建設過程中需要重組的人才、技術、資訊等各方面資源，高等教育創造的技術型、創新型人才則提供了這方面的資源。反之同理，大灣區的蓬勃發展也為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多條件與可能性。兩者互相促進與驅動，從而實現大灣區的區域可持續發展。[2]

2.滿足人才需求，為灣區發展提供創新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被稱為“世界製造業基地”，其製造業發達，但是醫療、科技資訊產業、教育等高端服務業相比其它三大灣區而言所占比重較低。目前，香港的主要產業為金融服務、旅遊、貿易、物流等，澳門以博彩旅遊、建築地產等為主要產業，內地 9 市則形成了以製造業為主導的產業體系。粵港澳大灣區良好的製造業基礎能夠給予產品研發設計、資訊技術、金融保險等生產性服務業廣闊的發展空間，應該把握此機遇發展創新型經濟。[3]發展創新性經濟離不開人才，高等教育能提供大量創新型人才。2019 年發改委發佈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中提到，要將粵港澳打造成國際化教育高地。高等教育是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培養出了大量的科研創新型人才，人才在大灣區產業轉型和創新發展中需求巨大。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世界其它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均產出水準相對較低，只有 22291 美元，是東京灣區的 50%，紐約灣區的 42%，三藩市灣區的 20%。[4]而這些世界一流灣區無一例外有著大量創新型人才的支撐，其周圍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學聚集，為企業輸送大量創新型人才。[5]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亟需人才，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教育，教育為灣區發展提供創新動力。

3.促進文化交流，推動灣區深度協同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存在“一國兩制三法域”，華夏文化、英倫文化、拉丁文化等文化共存，語言方面

[1] 許創穎：《 “一帶一路”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創新發展路徑研究》，載於《區域經濟》，04，2022，95-97。

[2] 周春山，羅利佳，史晨怡，王玨晗.：《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時空演變特徵及其影響因素》，載於《熱帶地理》，37（6），2017，802-813。

[3] 劉毅，王雲，李宏：《世界級灣區產業發展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啟示 》，載於《中國科學院院刊》35(3)，2020，312-321。

[4] 杜怡萍：《粵港澳大灣區背景下職業教育的發輾轉型》．載於《高等職業教育探索》，17（4），2018，1-5。

[5] 買琳燕.：《世界主要灣區高職教育合作經驗對粵港澳大灣區高職教育合作發展的啟示》，載於《職業技術教育》，41（36），2020，67-72。

也各有特色。同時，香港的官方語言為中文（粵語）和英文，澳門的官方語言為中文（粵語）和葡文，而內地則是多用中文（國語），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導致三地青年在思維和溝通上出現一定程度上的障礙。在社會制度上，中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而在香港和澳門實行資本主義。港澳回歸之後，這種差異導致衝突更為凸顯，其本質上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出現偏差，更為深層次的是三地教育協同的深度融合。雖然地理位置鄰近，但三地在各制度上均存在差異，一直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協同。但是在大灣區建設之後，推進高等教育協同發展可以將三地各自的優勢教育資源、成果進行整合。[1]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契機。追根溯源，粵港澳三地具有親厚的血緣關係，而且同屬於嶺南文化，在文化傳統、地理歷史、民族淵源上都有著不可分割的親緣關係。[2]借此先天優勢和基礎，通過高等教育的協同發展可以更好地實現文化交流與融合，縮小兩岸三地的距離，彼此間將更加瞭解，從而共創科技文化成果，促進灣區的深度協同。

二、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動因

（一）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和肇慶市九個城市組成的城市群。截止至 2022 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占地面積達到 5.6098 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達到 8662 萬[3]，相當於每 100 個中國人就有 6 個生活在大灣區。同時，截止至 2021 年，其經濟總量超過 1.95814 萬億美元[4]，與紐約灣區和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相當，超過三藩市灣區。相較於其它灣區而言，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個較爲顯著的特徵，即該區域包含兩種制度、三個法律體系以及三個關稅區。這在國際上並沒有先例的。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不斷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內涵。

從以上數據可知，粵港澳大灣區要發展就必須進行適應三地發展的產業調整和轉型。這就需要大量的創新型人才，而高等院校就是“主動脈”。這與《綱要》提出的“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推進粵港澳高等教育在招生就業、培養培訓、師生交流、技能競賽等方面的合作，創新內地與港澳合作辦學方式，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要求是不謀而合的。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相關部門也積極推動高等教育的合作與發展。2020 年教育部、廣東省人民政府印發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發展規劃》，持續推進高等教育合作發展，把大灣區打造成為國家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機制改革試驗區、教育服務“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重要樞紐以及內地與港澳教育全面合作發展的生動典範，建成世界領先水準的高等教育體系和國際教育示範區。2021 年廣東省人民政府正式印發《廣東省教育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發展，加快打造高水準、開放型、國際化高等教育資源聚集高地。在 2022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粵港澳大灣區有 14 所高校入選，其中香港 7 所、澳門 2 所和廣東 5 所。

（二）當前粵港澳大灣區高校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實踐模式

[1] 董平，李豔娥：《教育生態學視域下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生態發展探究》，載於《教育與職業》，20，2019，53-57。

[2] 陳志柔，林佳蓉，詹雪敏：《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融合策略 ——基於嶺南文化淵源史料研究》，載於《對外經貿》，06，2021，28-31。

[3] 數據來源於相關貿發局經貿研究官網，載於 https://research.hktdc.com/sc/article/MzYzMDE5NzQ5，2023-07-12。

[4] 同上。

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佈以來，多所新高校的建設已納入了大灣區規劃中，例如位於廣州的黃埔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位於東莞的香港城市大學東莞校區、大灣區大學。此外，香港都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大灣區校區等高校籌備已正式列入廣東省“十四五”規劃。在國家的戰略支持下，兩地高等教育合作交流明顯加強，深度與廣度也不斷拓展，以下面以幾個高校為例子，分析其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中的典型實踐模式。

1.赴內合作辦學，聯合共建優勢學科

澳門科技大學與珠海市人民政府於 2019 年 5 月簽署了框架合作協定，雙方將在創新教育、前沿科技、優質醫療與醫學研究、醫藥與健康產業、下一代互聯網、空間大資料、人工智慧航空航太等領域深度合作。同年 11 月 14 日，澳門科技大學與珠海科技學院簽署戰略合作協定。澳門科技大學支援珠海科技學院“聯合國際學院”建設，共同推進本科與研究生教育合作。該國際學院將作為一個聯結兩校、深化合作的交流平臺，結合兩校優勢學科，在更多領域賦能兩校協同向上發展。2020 年 11 月 30 日，澳門科技大學與珠海市人民政府正式簽署合作辦學協定。[1]協定內容中包括，澳門科技大學將設立珠海校區，擬落戶珠海（國家）新技術產開發區，開設相關學科研究生層次（碩士及博士）的學位課程。珠海校區將沿用澳門科技大學的辦學理念和管理方法，實行獨立管理，彌補澳門校區辦學和科研空間的不足，著重在提升學習環境、產學研對接方面做好配套，解決產、學、研中澳門地區產業單一、空間不足的短板問題。

2.加強校企合作，聯動社會企業單位

大灣區高校與世界 500 強及行業龍頭企業保持緊密合作，通過校企合作，建成特色產業學院。為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穩就業”“保就業”決策部署，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動人才培養與就業有機聯動、人才供需有效對接。例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與騰訊科技（深圳）有限公司、阿裡雲計算有限公司共同舉辦了專項人才交流、行業認知科普、職業規劃輔導、就業實習綠色通道、產學研共建等活動，充分發揮了各自的優勢，形式豐富多樣。為了更好地幫助同學們探索自己的職業需求，暢通其就業管道，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職業規劃與發展處積極拓展用人單位資源，發展校企合作單位，舉辦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推薦專場、南方金融科技專場、龍崗區機關單位及中小學實習招聘會、專場宣講會、校外導師、企業參觀訪問、行業分享講座等活動。職業規劃與發展處現已與 450 餘家用人單位建立交流合作，與 20 餘家企事業單位簽訂合作協定。[2]自 2022 年 12 月起，深圳職業技術學院與騰訊聯手打造行業示範的新型校企合作模式，共育符合產業互聯網發展需求的複合型、應用型創新人才實踐，並開展了一系列深度的合作，如：騰訊云聯合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共同舉辦云開發者大賽，以技術＋實踐爲主題，培養高質量複合型人才，助力社會企業完成數字化轉型。

3.舉辦交流活動，深化人文交流互鑒

為了加強三地青年之間的文化交流、實現精神共鳴、牢固情感紐帶，大灣區高校之間會舉辦各類聯合活動。例如“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美術與設計作品展暨第六屆廣東省高校設計作品學院獎雙年展”，這次活動更好地突出僑鄉在粵港澳大灣區交流合作中的“橋樑”作用。同時，大灣區高校可以以該活動為平臺，培養在大灣區建設中美術與設計領域的複合型人才，傳播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進一步加強三地之

[1] 《珠海澳門兩所高校正式簽約，共同推進本科與研究生教育合作》，載于澎湃網：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404206，2023-07-03。

[2] 《喜訊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與騰訊、阿裡雲校企合作項目入選教育部高校學生司第一期供需對接就業育人項目立項名單》，載於搜狐網：https://www.sohu.com/a/538435546_121124212，2023-07-03。

間的思想交流合作，堅定文化自信，強化文化認同和使命擔當，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為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藝術交流、服務國家戰略和區域繁榮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三、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剖析

縱觀世界灣區的高等教育發展現狀，三藩市灣區的協同發展建設案例值得藉鑒。衆所周知，三藩市灣區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美國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優勢的重要地區。通過探索三藩市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具體案例，可為我國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提供參考。[1]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三藩市灣區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優勢，即科技創新度高。這源于大學與科技發展之間的緊密聯。換言之，三藩市灣區的發展極大得益於此。這種關係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科教融合，這就不得不提到斯坦福大學這一經典案例。斯坦福大學的前身是一個農場，這個農場及其荒涼偏遠，用於培育和訓練優種賽馬，彼時斯坦福大學地處偏遠西部，教育資源落後，但是斯坦福工程學院的院長特曼想到一個好方法，即利用學校面積大，而空閒面積沒有充分得到利用，因此他將其以極其低的價格租借給畢業的校友或者工商業界。從此，斯坦福擁有了工業園區。這在首家做出如此舉措的美國大學。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與斯坦福合作，斯坦福的工業園區日漸壯大，以至於後來硅谷的成長和塑造均與該做法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說斯坦福與三藩市灣區和硅谷之間是互相成就。二是產教融合，這就不得不以聖約瑟州立大學這一典型案例。它生動地體現了應用型大學與產業技術創新的關係。該學校的地理位置處於硅谷的核心地帶，毗鄰全美的科技中心。因為學校專業設置豐富、專業程度高，也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學生前往該學校進行學習。學生畢業后通常願意選擇留在本地工作。据了解，該學校每年向硅谷輸入大量電腦科學、商學和其他專業的畢業大學生。由於該灣區的企業不僅能夠提供豐富的崗位，而且工作的起薪點也非常高，平均可以達到 86000-114000 美元，因此學生們一般可以先去蘋果、微軟等五百強企業實習，之後甚至留用，真正達到了將所學知識用於實踐，且就業率極高。[2]

相較於世界灣區的成功經驗，我國的粵港澳大灣區存在著一些固有的特殊的情況，制約著高等教育的協同發展。綜合分析，可以歸納爲以下三點：

（一）粵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協同政策尚不完善

2020 年，教育部、省政府聯合印發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發展規劃》，明確到 2035 年的粵港澳大灣區將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水準的高校，產出一批對世界科技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有重要影響的原創性科學成果，成為世界高等教育合作發展和創新發展先進典範。一直以來，相對於中國內地，港澳地區的自主辦學權會大一些，在制度建構上的探索也更為開放。近年來，國家開始逐步注重政府規劃引導，但是由於政策實施的時間較短，內容不夠完善、經驗不足等問題難以避免，[3]部分粵港澳院校之間的合作還僅限於院校個體之間的聯繫，缺乏政府部門强而有力的引導和規劃，導致合作形式可能較為隨意鬆散，難以達到令人滿意的成效。這種合作更多流於形式，無法體現院校特色，更難以“因院校制宜”地推動其與港澳地區的高等教育之間的協同發展。

---

[1] 安琪，沈蕾娜.：《舊金山市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分析》，載於《世界教育資訊》，02，2021，58-62。

[2] 盧曉中，卓澤林.：《灣區高等教育的形成與發展 ———基於粵港澳大灣區與舊金山灣區比較的視角》，載於《高等教育研究》，02，2020，90-98。

[3] 王志強，張海軍.：《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合作發展的實踐邏輯與未來關切》，載於《大學教育科學》，03，2021，110-117。

（二）粵港澳三地的產業結構發展相較不平衡

一直以來，粵港澳三地的產業結構發展呈現出不平衡的態勢，主要體現為：香港地區的第三產業較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發展更為發達，其服務業占比大；澳門地區的第三產業具有較好的發展基礎；內地的 9 市在各自的發展上差異較大。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重點是促進產教融合和產學研融合，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要契合區域產業結構。

在香港地區的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中，第二產業占的比重更大，與其第三產業占比大的客觀情況不同，顯然這與其發展需求並不匹配。澳門地區的設置占比中第三產業最高，即專業設置則更為協調。內地 9 市的專業設置結構與產業結構偏離度也較小，但是每個城市的情況也各有不同。由於三個地區各自的產業結構發展側重點與優勢有所不同，因此專業設置比重也不同，對於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鏈與產業鏈的銜接可能造成一定障礙。[1]

（三）粵港澳三地的制度等方面的差異性較大

由於粵港澳三地在制度、文化、產業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高等教育的協同發展存在一定的難度。

1.制度差異

粵港澳三地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存在著差異，即包含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內地和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以及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相比其它三大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其顯著的特色，這也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在協同中更加複雜。首先，在高校的管理機制方面都有很大差異，例如：撥款體系、品質控制機制、教師管理、權責機制等。其次，作為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與內地 9 市之間會形成行政壁壘，導致人才、資金等資源難以流動起來，部分區域之間還存在同質化競爭和資源錯誤配置的問題，例如課題申報是否符合資格，學生的身份定性等協同問題亦存在一定的爭議，也構成一定的障礙。

2.文化差異

粵港澳三地本是同根生，但由於歷史原因導致三地的文化存在差異。首先是語言方面，澳門的官方語言是中文和葡文，相應的教育也有兩種模式，學校也分為中文學校和葡文學校，而香港則是以中文和英文為主。其次是文化認同感方面，雖然部分港澳青年在本地求學和工作，而內地近年來發展飛速，因此仍然有部分青年對內地的瞭解還保留在以前。文化認同通常來自于自然認同、溝通交流、民族融合、殖民活動等。值得欣喜的是，在回歸祖國後，部分港澳青年已經逐步接受中國內地的文化。最後是深度交流方面，文化認同的建構離不開三地的對話交流。[2]雖然內地和港澳一直在推動文化交流，但活動仍然較為淺層，缺乏深入溝通的渠道。[3]以上這些原因阻礙了文化差異的減小。

3.產業差異

如上所述，香港地區的支柱產業是金融、旅遊服務、貿易物流等。澳門地區的支柱產業是博彩業，但是單一的產業導致其抵禦風險能力較低。內地的 9 市在各自的發展上差異較大，廣州市的工業尤其是製造業是其支柱產業，還包括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其服務業呈穩步上升的態勢。深圳的支柱產業則是高新技術、文化創意和金融等產業。相較而言，東莞、惠州、佛山和中山這四個城市的第二產業發

[1] 查婷俊.：《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的對比分析》，載於《城市觀察》，02，2021，21-36。

[2] 鄧志虹：《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認同研究》，載於《合作經濟與科技》，10，2021，24-25。

[3] 侯偉強，吳春萍.：《粵港澳大灣區高職院校創新創業教育合作發展研究》，載於《教育與職業》，12，2019，100-103。

展態勢比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更為發達，其支柱產業主要為紡織、電器器械等製造業。近年來珠海、肇慶和江門的第三產業比重逐年上升，並且已超過了第二產業。各地產業結構的不同意味著對人才的需求類型不同，相應的高等教育專業設置的比重也應該存在相應的差異。

四、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具體路徑

結合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特徵，並藉鑒先進的域外經驗，針對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本文提出以下三方面的具體路徑。

（一）突破制度壁壘，推動教育政策落地

行政體制的差異造成的壁壘可以由政府來進行引導打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制定相關的政策並推動政策的實施。[1]譬如，先由國家各部位牽頭，制定宏觀的頂層設計，再由廣東省教育廳、省政府等與港澳教育部門合作制定粵港澳大灣區聯合辦學機制，訂立細化的教育合作交流框架。具體而言，組織建立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管理部門或者工作組，專門就粵港澳三地之間的教育合作進行規劃；提供專項資金支持，激勵三地的高等院校建立合作項目、申請專項資金，提高參與主體的積極性；落實財稅政策，推動企業參與高等教育，通過深化產教融合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除了政府間的合作外，三地的高校也可制定體現自己區域特色的、有利於促進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的機制，例如開展更多“2+2”“3+1”聯合學位、暑期課程學分互認等開放培養項目，建立聯合培養機制、三地高校科研合作機制，以及構築創新要素集聚的環高校創新創業科研圈。

2000 年香港首次推出了副學士學位課程，其原因是在二十世紀 90 年代中後期香港進入了知識經濟的時代，迫切地需要各類高級專門人才，而當時的高等教育制度無法滿足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故香港特區政府推出了副學士學位課程。[2]該項政策成功地打通了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的通道，使得接受職業教育的中職和高職學生也能升到本科、碩士、博士，高等教育因此吸收到了更多層次和類型的實用人才。我國內地也應當加快建立專科教育層次的副學士學位制度，有效銜接與溝通高等職業院校與普通高校的學位制度，豐富高等教育人才類型，適應當前經濟社會對高技術專門人才的需要，從而協同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制度。該項制度在內地的推行應當由政府來主導，以保障能夠切實進行，同時適當引入民辦性質元素，為副學士學位課程的開展節約成本，開拓了新的發展空間，激發市場辦學的活力。

（二）多方聯動，促進教育與產業適配

校企合作是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的重要內容。校企合作的形式最早出現在 19 世紀末的德國，主要包括以企業為主和以學校為主的兩種模式，對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的形態各異，從內容上來看，主要包括六種：一是“引進智力”模式，企業可以派駐管理人員或技術骨幹進校內對學生進行實訓，建設專業指導委員會，成為兼職教師等；二是“引進資金”模式，學校與企業之間達成資源互換，由學校提供場地或者生源，由企業提供資金或設備等；三是“實習基地”模式，由企業提供實習基地，對實習學生進行指導培訓；四是“訂單”模式，企業與學校簽訂協定，企業對所需人才提出要求，學校根據要求培訓對應人才，實現實習與就業同步；五是“服務企業”模式，

[1] 樊明成，買琳燕：《粵港澳大灣區高職教育合作：現狀、制約因素與對策》，載於《廣東技術師範大學學報》，05，2020，1-7。

[2] 鄔紅波.：《我國香港特區副學士學位課程建設政策分析及啟示》，載於《中國成人教育》，09，2019，73-77。

主要是學校為企業提供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科技研發、技術教學、資訊諮詢；六是“綜合”模式，即對於上述模式的兩種或多種結合應用。

目前港澳的企業和資本在大灣區的流動並未與三地高等教育協同發展配套，高等教育協同發展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仍存在許多發展空間。一方面，可以參考借鑒東京灣區的經驗，粵港澳大灣區將院校聯盟擴展為產學研聯盟，增強產業對接和科研成果的轉化。日本以產學結合的方式，實現了企業與學校之間的共贏。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鑒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的校際聯盟合作，在校際校企合作中探索多種模式。例如：紐約灣區的政府非常重視創新，不僅推動應用科學的招商引資，還設立了“數位紐約”項目的支援，提供前沿完善的資訊服務，即通過行業協會、企業、社會組織等多元渠道，促進教育與產業適配，以此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制度的協同。依託標杆企業，比如與學校建立特色品牌專業，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企業深度參與到專業培訓中，由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訓課程，引入企業管理模式和真實的教學情境，實現產業鏈與專業鏈的有效銜接。這不僅可以使得專業更具實用性，還能夠解決企業專業人員的用工問題，互相促進，達到良性循環的效果。同時，還可以通過建立企業的資金激勵機制的方式，根據企業接收跨境實訓的學生數量撥付經費和補貼，或者對該類企業優先放貸和提供資金支持，從而促進教育與產業更加適配。

（三）跨越文化溝壑，加強教育文化交流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出發，粵港澳大灣區承載著輻射和帶動泛珠三角區域發展合作的功能。一直以來，內地的教育方式偏向課堂教學、理論教學，缺乏實踐教學、體驗式教學，而港澳地區在體驗式教學方式則更加豐富，更加注重實操層面的訓練，也會通過體驗日、開放日、校友日等活動加强溝通合作和深化學習交流。因此，聯合三地的高校組織多元化的教育交流合作活動非常重要。

一方面是專業知識的學習，可以通過遊學項目、活動學術競賽、交換生項目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為大灣區高校學生提供教育文化交流的平臺，或者是內地的高校可以組織學生參加港澳高校開設的選修課和體驗課等，從而感受港澳高校的氛圍和模式。[1]尤其在科技創新方面，深圳的科技創新基礎是在整個粵港澳大灣區中發展最快最好的，[2]通過搭建合作型實驗室，分享三地的實驗創新成果，實現科研資源分享，彙集三地的科研人才進行智力成果分享，從而加強科技創新知識的交流。另一方面是文化藝術的交流，吸引粵港澳三地的青年學生廣泛切實地參與進來，瞭解中國上下五千年文化歷史傳統，產生情感共鳴，全面提升愛國情懷，[3]開辦“一國兩制”遊學班，[4]融入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特色，結合三地學校的特色，進行短期的遊學活動，例如“尋根文化之旅”“紅色之旅”“重走習近平總書記視察路線遊學團”“港澳服務業遊學團”等。港澳青年一代是“一國兩制”事業薪火相傳的生力軍，是推動港澳繁榮穩定的強大力量。通過上述方式，港澳青年認識到他們所肩負的建設港澳、振興中華的重大使命，也能走出校園，開闊眼界，豐富閱歷，還能提高身份認同感。

五、結論

[1] 王榮桂：《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繼續教育合作模式探析》，載於《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02，2021，10-14。

[2] 宋丁：《粵港澳大灣區：趨勢、問題及深圳對策》，載於《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05，2017，10-16。

[3] 許長青，盧曉中：《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融合發展：理念、現實與制度同構》，載於《高等教育研究》，01，2019，28-36。

[4] 林芸靜，周樂平：《粵港澳大灣區繼續教育合作模式探析——以澳門城市大學繼續教育的合作為例術》，載於《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2，2020，7-11。

高等教育協同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規劃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為了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滿足大灣區人才需求和促進三地文化交流，高等教育的協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雖然，目前部分高校在推動高等教育協同發展中起到了先行示範的作用，提供了許多可供借鑒的實踐模式。然而，對比其它世界級灣區，我們不難發現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協同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政策制定不夠完善、三地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三地制度差異大等問題，導致無法形成發展合力。為此，本文提出突破制度壁壘，推動教育政策落地；激勵多方聯動，促進教育與產業適配；跨越文化溝壑，加強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徑，從而實現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協同發展。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U Songxin

Abstract：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ch can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meet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hree places. Taking sev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exampl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model in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such as: limited by imperfect policy formulatio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three region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the three regions Differences and other factors have not yet formed a joint development force. Finally,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gui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realizing industrial education matching, promoting educational exchanges, and overcoming background differences.

Key words：Higher education；Coordinated development；Path constructio